

周彦文 刘工践 贺雄飞 主编

商战名流丛书

魚龙混杂

形形色色的官商巨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记叙了清末和民国时期13个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的兴衰过程及主要生活片断，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轨迹。他们的兴衰史，也是近代中国的缩影。书中以丰富的材料展现了近代中国从封建的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的艰难，封建官僚资本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维护封建制度的矛盾心理，以及民族资本举步维艰，四大家族疯狂聚敛的实况，以事实说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本书共15万字，可读性强，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大中专院校师生的很好的参考书。

1992年7月

前　　言

“商战”的思想，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郑观应第一个以完整的形式提出来的，是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军事以外，还有经济的侵略。他主张用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用他的话说，就是“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复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

郑观应的商战论无疑比林则徐的“炮利船坚”，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强国利民主张具体明确了许多。它表明一种思想学说的深化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前仆后继的斗争实践赋予他的灵感。

今天看来，郑观应的商战论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我们重览他的学说主张，仍可依稀感觉到中国近代思想家那智慧的头脑和为了国富民强而跳动的拳拳之心。

商战论与许多闪烁着智慧的前辈们的思想学说一样，是我们珍贵的遗产。可惜的是在郑观应以后的经济思想史中，关于商战的理论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存在决定意识，这也许与中国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无关系。这套丛书的名称中采用了“商战”一词，表达了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商战论这一宝贵思想学说的愿望。

这些年来，商品经济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不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必然。

在人类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出现要早于资本主义。因此，大可不必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可是，对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诸多紧密联系，我们又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确实，我们对商品经济的了解还不能说是深刻、全面而具有更多切身感受的。我们有必要进行广泛、缜密的了解和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在研究商品经济方面已经为人类作出了宏伟辉煌的建树。他们的建树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但是，如果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终极的、已经穷尽的真理，因此，除了惊诧、目瞪口呆之外，再也无事可干，那就是极大的荒谬。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司空见惯的商品入手，对商品经济进行了科学而具有阶级性的研究，列宁则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商品经济作了革命性的论断。我们深信，人类对于商品经济的研究决不会停止。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生活实践在呼唤着新的理论的诞生，同时，也在丰富和发展着已有的理论。今天，人类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包括微观、宏观、中观各个层次的研究，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利益出发的不同立场的研究。真是五花八门，气象万千。

这套丛书试图从人和人的行为入手，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做一些资料性的工作。书中囊括古近中外一些商品经济大战中的名流人物。有理财大家、巨贾豪富、政客奸商、企业怪杰，也有爱国商人等。通过这些人物的行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类在商品经济大战中表现出的那些智慧和才华，以及高尚的品德和卑鄙的伎俩，而且，可以看到产生这些行为的

相应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吧，或许也能看到一片大风景。

周彦文

1991年5月19日于北京

目 录

| | |
|------------------------|------|
| 长于“义理经世”之学的赳赳武夫——左宗棠 | (1)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 (3) |
| 筹饷难以筹兵，筹粮难以筹饷，筹转运又难以筹粮 | (6) |
| 兴利之道，首重民生；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 | (13) |
|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导——李鸿章 | (18) |
| 屡上条陈 力主变法 | (19) |
| 发展商业 以富求强 | (21) |
| 创办洋务 工业救国 | (23) |
| 创立的几个工业部门 | (26) |
| 洋务运动之中坚 近代工业之巨擘——张之洞 | (35) |
| 从清流骁将到洋务中坚 | (36) |
| 在两广奠定办洋务的基业 | (41) |
| 在湖广再接再厉办洋务 | (46) |
| 晚清民用企业的大经营家——盛宣怀 | (56) |
| 早年生涯 | (56) |
| 参与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创办 | (57) |
| 试办湖北煤铁总局 | (60) |
| 大力创办和经营全国电报局 | (61) |
| 总理汉冶萍煤铁公司 | (63) |
| 创建中国通商银行 | (65) |
| 督办铁路总公司 | (67) |
| 简单结语 | (69) |

| | |
|------------------------|-----------------|
| 一个多重身份的实业家——唐廷枢 | · · · · · (70) |
| 出身贫寒 聪明能干 | (70) |
| 十年买办 腰缠万贯 | (71) |
| 经营航运 迎接挑战 | (73) |
| 苦心办矿 挤走洋炭 | (79) |
| 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徐润 | · · · · · (84) |
| 轮船上的少年 | (84) |
| 洋行里的学徒 | (85) |
| 自立门户的买办 | (86) |
| 戴红顶子的商人 | (88) |
| 轮船招商局的会办 | (88) |
| 景纶袜厂的老板 | (91) |
| 北洋实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 · · · · · (93) |
| 弃科举 铸大元 初受赏识 | (93) |
| 赴东瀛 兴工艺 官业凋零 | (95) |
| 创启新 建滦矿 移宫换羽 | (97) |
| 持财权 扩新业 锦上添花 | (100) |
| 失靠山 难支撑 意灰心冷 | (102) |
| 封建官吏中的爱国者——张连芬 | · · · · · (104) |
| 爱国有心 创建中兴煤矿 | (105) |
| 利益均沾 中兴煤矿繁荣 | (107) |
| 珠联璧合 中兴煤矿的鼎盛 | (109) |
| 国民党政府的敛财管家——孔祥熙 | · · · · · (114) |
| 青年得志 | (114) |
| 长袖善舞 多财善贾 | (115) |
| 因妻得官 因官发财 | (117) |
| 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 | (118) |

| | |
|--------------------------------|-------|
| 操纵“三不公司” | (120) |
| 军火买卖中的发财之道 | (121) |
| 公债发行中的贪污盗窃 | (123) |
| 聚敛钱财 手腕多端 | (126) |
|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 | (129) |
| 强取豪夺 不择手段 | (129) |
| 垄断山西经济命脉的阎记公司 | (134) |
| 实行“新经济政策” 大发国难财 | (137) |
| “平民经济”口号下的疯狂掠夺 | (139) |
| 以“党营”为招牌的掠夺者——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 (142) |
| 少年得势的陈氏兄弟 | (142) |
| 蒋陈世家的两代关系 | (144) |
| 以“党营”为招牌巧取豪夺 | (145) |
| 紧抓银行 广敛钱财 | (147) |
| 同孔、宋家族争夺财富 | (152) |
| CC 豪门的聚敛特色 | (156) |
| “中国的摩根”——宋子文 | (159) |
| 青少年时代 | (159) |
| 为革命理财 | (162) |
| 在十字路口 | (165) |
| 围绕公债的争斗 | (171) |
| 官场倾轧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产生 | (178) |
| 从中国银行董事长到美援专管员 | (186) |
| 投资幌子下的巧取豪夺 | (193) |
| 流水落花前的一掷 | (201) |
| 宋氏财产之谜 | (206) |

长于“义理经世”之学 的赳赳武夫

——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出生在湖南湘阴的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左斐中，国学监生，以教书为业。父亲左观澜，县学廪膳生。左宗棠在家中排行第六，出生时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母亲没有奶水，又请不起奶妈，只能“嚼米为汁”喂养长大。据说左宗棠年老时身体发胖，腹大肚脐不深，就是因为小时饮食不足，日夜啼哭，致使肚脐突出。21岁时，同出生广湘潭大地主家庭的周诒端成婚，由于家境贫寒，只得倒插门到岳家，成了一个在封建社会里十分不体面的“赘婿”。

左宗棠从小随祖父读书，祖父死后，由父亲继续授业。两位长者的循循善诱和严格管教，使左宗棠打下了十分扎实的文化知识的根基，并写得一手秀美挺拔的好字。左宗棠渊博的学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地学。他15岁就开始阅读顾夷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道南的《水道提纲》等地学名著，除认真写读书札记外，还自己绘地图。第二部分是农学。他几乎读遍了所有讲农事的著作，不仅爱读，而且还爱干农活，他开湘阴种茶之先河，种桑养蚕、种竹育花，样样在行。第三部分是水利、荒政、田赋、盐政之学。在一个农业国中，这四方面被称为

国计民生的四大环节。老百姓的生命线在水和天，荒年靠政府救济，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田赋和盐铁，田赋和盐铁又要依赖于年成的丰歉。以后左宗棠所取得的煊赫业绩，皆得益于这三部分学问。

左宗棠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空前动荡的时代，席卷华北的白莲教、天理教农民起义，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使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政治腐败，抱残守缺的清王朝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惊恐万状，苟且偷安。于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便脱颖而出，大胆针砭时弊，抨击朝政，呼吁变革现状，图谋富国强兵，成为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作为没落的小地主家庭的一员，左宗棠亲身感受到了豪强恶霸的残暴，亲眼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饥饿及死亡。鸦片的大量输入，更使他感到窒息和苦闷。当时正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地主阶级改良派思想，则给这个处于困惑和迷惘中的青年带来了一线光明和希望，他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一边。从18岁开始，他就在龚自珍、魏源等人思想的影响下，研读舆地之学。1832年，左宗棠中式第十八名举人，便准备进取状元进士，以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抱负。然而，1833年、1835年和1838年他三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之后，他发誓与科举绝缘，用积累起来的束脩（办私塾学生交的学费），在湘阴柳庄买地70亩，一边教书，一边指导雇工种茶、竹、桑、水稻等农作物。在过着所谓“耕读”生活的同时，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他关心国家的安危，研究探讨盐政、漕政与荒政，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地理形势，使他的思想越来越具有改革派的特点。他抨击昏庸朝政的因循守旧与无所作为，主张加强国防，抵御侵

略，还极力探讨和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以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家收入。这些思想，无疑对他以后的事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师夷长技以制夷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苦难，也给一个封建主义的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短短的 40 年，西方国家在纺织、交通、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西方工业化的潮流，也不可避免地猛烈冲击中国这块古老落后的大地。当时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都在千方百计地购买洋枪洋炮来装备自己。有资料证明，1854 年，曾国藩湘军水师装备了数百尊“夷炮”；太平天国晚期，李秀成“一千名卫队完全佩来福枪”；1863 年秋，苏州太平军中有“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太平天国史料译丛》）。军事装备上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不可能逆世界工业化的潮流而动，它必然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自己的近代工业。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没有近代工业的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只能是处处挨打。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863 年，李鸿章攻陷苏州后，把他在 1862 年创设的上海炮局迁往苏州，建立了苏州洋炮局。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

机器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

受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爱国思想的影响，并目睹了在洋枪洋炮支持下的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和掠夺行径，左宗棠积极投身于这场洋务运动。他于1866年倡导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目的有三：第一是为了加强海防，在海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第二是为了发展沿海商业，重新控制被外国海轮控制的沿海运输，扶持江、浙等沿海商人。第三是为了发展民用工业，带动生产一些民用产品。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指导思想本质上是爱国的，欲以加强国防近代化来洗雪国耻，所以他在具体的做法上念念不忘掌握自主权，为此他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的名言，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独立人格。向外国人借船，不但自己不能自由支配，而且往往要陷入诸如报酬、赔偿等无休无止的纠葛之中；雇船似乎好于借船，但费用太大，船主往往利用我们用船心切而漫天要价，船员也未必服从中国方面的管理。英国人经常鼓动中国人买船，认为造船的投资太大，以中国的贫穷而论，恐怕难以胜任。这是帝国主义企图破坏中国造船业的一个阴谋。买船从表面看，固然比借船、雇船要省事，但是它也有一系列无法避免的弊端，外国人在卖船过程中往往从中舞弊，以次充好。船买来后，由于我们自己知之甚少，还是要用外国人来管理和驾驶。一旦船坏了，还要去求外国人修理。外国人就是利用这些弊端来敲榨勒索中国人。所以，归根到底，只有自己造，才能有自主权。对于这一点，左宗棠是看得很准的。他认为，办理船政局，仅仅学会制造轮船、军舰等，还只是学了点皮毛，关键是还要学会驾驶轮船和操纵机器的技术，“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

《左文襄公全集·书札》卷十），否则，我们还是不能彻底自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左宗棠从“师”入手，落实到“制”，而且“学重于造”。在福州船政局中除了拥有大量的工厂外，还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在当时是最现代化的海军学校、造船工程学校和造船技工学校，这些学校接收十多岁的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免费入学，聘请外国人任教，先学语言文字，后学数学制图。左宗棠认为只有这样，造船事业才是完整的。这些学校为国家引进了西方发达的造船科学技术，造就了象邓世昌、林泉升、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等一大批海军人才，也造就了象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魏瀚等一大批制造轮船、军舰的人才。

从 1869 年到 1884 年这 15 年间，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技术有了迅速发展，先后制造商船、军舰共 24 艘，吨位逐年增加，并且配备成了一支由自己制造、驾驶、管理的独立自主的海军舰队；船体结构也由木质发展到铁肋木壳，铁肋双重木壳，最后又制造出了铜壳甲；船速由 9 涩/小时发展到 15 涩/小时；船上的武器，由前膛炮改装成为后膛炮、连珠炮；主机由立机改为卧机、省煤涨力机。

福州船政局的发展在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74 年，日本军队侵犯台湾。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福州水师进驻台湾，最终胁迫日本政府派使节到北京议和。这支福州水师的舰艇，大部分是由福州船政局的马尾船厂制造的。中法战争之前，中国建有著名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闽江水师三大劲旅，北洋水师拥有兵舰 10 余艘，其中由马尾船厂制造的占五分之二，南洋水师拥有的军舰中，有三分之一为马尾船厂所造；闽江水师共有 11 艘军舰，马尾船厂制造了其中的 9 艘。

筹饷难以筹兵，筹粮难以筹饷， 筹转运又难以筹粮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远征西北，督办新疆军务。当时虽已64岁高龄，却在此开创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19世纪末，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疯狂瓜分世界的高潮。在远东地区，极具战略价值的我国西北边陲——新疆，成了当时各路列强为之垂涎的一块肥肉。从18世纪中叶开始，沙俄就向中亚进行贪得无厌的领土扩张。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沙俄的侵略步步升级，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1803年，沙俄侵入中国新疆西北部的斋桑泊地区。

1847年，沙俄出兵侵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

1851年，沙俄借美、英、法等帝国主义鲸吞中国领土之势，胁迫清政府订立《伊犁塔尔巴哈台章程》，使沙俄攫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地区的通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和传教等特权。

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强迫清政府在堪分中俄西段边界的问题上，屈从沙俄的指挥棒进行谈判。同时，沙俄屯兵格根河、伊犁河及塔城地区附近，以武力相要挟。

1864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侵吞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5年春，浩罕国酋长阿古柏与清政府内的敌对帮派

势力相勾结，率军入侵南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指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和阗）。

1871年，沙俄利用新疆的混乱局面，出兵侵占了在经济上是新疆西部的粮仓，军事上是北疆门户的伊犁地区。至此，新疆上空，乌云密布，大部分地方已沦为异区。

1873年，英国为了同沙俄在中亚进行殖民竞争，加紧进行拉拢阿古柏的活动。他们用大量枪炮武装阿古柏匪帮，千方百计使阿古柏政权独立。

1874年2月，阿古柏与英国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承认“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给予英国在南疆通商、低税、领事裁判权，英国臣民有在当地购买和租用土地、房屋或货仓的特权，阿古柏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和肢解中国新疆的工具。

侵略者的残暴蹂躏，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竞争，使整个新疆地区动乱不止，民不聊生。

长期镇压农民起义的戎马生涯，使进入晚年的左宗棠病魔缠身，加之对宦海生活的厌倦，早有告老还乡的意愿。然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左宗棠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他决心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祖国山河，宁可“马革裹尸”“老死西域”，也不愿解甲归田、苟且偷安。

作为西征军的主帅，左宗棠从来都是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经济。全歼阿古柏匪帮、收复伊犁。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倒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胜利更为贴切。左宗棠在筹措西征军饷银，主管西征军军粮，马干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和遇到的困难，都是难以想象的。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李鸿章的阻挠，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

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左文襄公全集·书札》卷十）事实确是如此。

西征军共计 130 余营，官兵七八万人，每年需饷银 600 余万两，加上出关粮运经费每年计 200 多万两，全年经费总计为实银 800 余万两。

然而，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根本无从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西北地方向来贫困，甘肃和新疆的行政开支，就是在平时，也采用各省协饷的办法，或靠清政府命令各省从地方收入中拨出部分经费支应。这次也只好沿用这种老办法。负担支应的省份，多是江苏、浙江等沿海省，而当时这些省大多遭到战乱的破坏，自己的财力也感不足，对于别省的需要，更是漠不关心。经过长年战乱的西北，物价飞涨，甘肃稻米以往是 20 余文一斤，麦面 10 余文一斤，西征时，每斤都已在一钱左右了，这就更加增大了饷银的需求量。李鸿章为了进一步扩充势力，推行其卖国投降政策，蓄意同左宗棠争饷。他利用沿海各省的消极心理，蛊惑和唆使他们拖欠协饷。1874 年冬，年关将近，西征军竟连一个月的满饷都发不出，而且来年开春应发各军的盐菜、粮饷、马干等款项都无着落。由于军费不足，大部分军队滞留关内，不能迅速开进新疆。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左宗棠一面向清政府奏陈情况危急，一面同李鸿章的捣乱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洞若观火，不畏权势，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的卑鄙目的是推行投降外交，从经济上卡住左宗棠的手脚，迫使左宗棠停止西征，放弃新疆。为了解救燃眉之急，左宗棠提出先向洋商筹借巨款。考虑到如果因经费掣肘而贻误收复新疆的战机，将根本上动摇清朝统治，清政府只得同意左宗棠的请求。左宗棠先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 300 万两，而这笔巨款左

宗棠又让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用协饷分作三年偿还，其中包括息银。这一为制服拖欠协饷省份而采取的有力措施既解了缺饷之困，又粉碎了李鸿章落井下石的阴谋，足以显示左宗棠的胆魄和谋略。

李鸿章并不甘心失败，在借款问题上又暗中捣鬼，勾结英国人出面干涉，左宗棠不得不又同破坏借款的反对力量进行斗争。

向洋商借款，照例应由海关出票，督抚加印。左宗棠本想请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经办此事。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历史上左宗棠曾有恩于他。不曾想在此之前，李鸿章已写信给沈葆桢挑拨他与左的关系。沈葆桢从他统辖的两江利益考虑，竟然上奏反对左宗棠借款。左宗棠当然是不服输的人，你两江不办，我可以请浙、粤海关出票，闽粤督抚盖章。李鸿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串通英商拒绝借款。这当然更难不倒左宗棠了，英商不借，向别国洋商借，后来果然在德国泰来洋行借到了500万两。向洋商借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始终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在与友人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六）不难看出其郁憤、愧疚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境。

饷银的筹措，为西征的胜利进军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有了饷并不等于有粮。西征军所在的甘肃，本来粮食生产就不充足，经过兵燹以后，人民逃亡，田亩荒芜，生产颓败，到处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的荒凉景象。甘肃境内采购不到足够的军粮，如果从四川、湖北等产粮区采购，又涉及到筹运之难。西北地区舟楫不通，地广人稀，一经兵祸，劳力更为匮乏。不比江南水乡，人烟稠密，远距离的大量运输，可用船